

优秀文艺作品让“中国梦”温暖世界

□艾 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故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情系寰宇,面向全球,以特点鲜明、内蕴丰赡、姿彩斑斓的“中国梦”感动人心,温暖世界。

“中国梦”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与美好愿景,但它同时也会带给世界以激情与温暖,而优秀的文艺作品则是辐射和传播这种激情与温暖的有效途径和便捷方式。我们的文艺走出去的范围越广,频率越高,“中国梦”就会让世界感知得越真切、越贴心、越灵动。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更深刻、更有力地观照社会生活,摄取时代大潮,体察精神向度,唱响大众心曲,以期在文艺越来越走出去的过程中更加广泛地将“中国梦”所蕴存的力量和温度传播给全世界。此中,一个最为直接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赋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语境的形成和日渐显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必然,而文艺如何在选择中更好地适应这种语境,却常常会陷于两难的境地。究竟是坚守和提升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根脉、地域特色与审美习性呢,还是放弃这一切而眼睛向外、追赶潮流,以效法和适应所谓的“国际标准”为向度?对此,我们必须从中做出科学考量与合理抉择。

一

文艺在任何时候都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和精神风貌的鲜明标识。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文艺的生产力和影响力自然也应当随之而得到壮大与提升。这不仅是一必然的,而且更是必须的。因为文艺如果不能与经济、社会、科技、外交等同步前进,同样形成巨大的辐射力和广阔的覆盖面,那就会使强国之路受到梗阻与壅塞。对于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就断言:“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而思想观念的形成和输出,则惟赖于文化创造和文艺作品的强大构建与强势推广。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既有着认知上的焦灼,同时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短板。从总体上看,无论文化创造,抑或文化生产,我们都较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比如,我国人均文化事业费,东部地区已达到44.38元,中部地区也已达21.26元。又如,即使是在农村,建有文化广场的行政村已占到26%,宽带的通达率也占到了27.7%。再如,2014年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已首度辐射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座城市,共有500多场国际文化活动现场靓丽登场。特别是好莱坞大片昨晚国产电影的时代已渐次成为过往,2013年不仅全国拍片638部,而且以217.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稳居世界电影市场第二。当然了,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们也有不俗的表现。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相比,文化前进的步幅仍旧是缓慢的和滞后的。迄今,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而在文化的创造、生产和输出上,我们却仍落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还不足4%,而美国、日本、印度的占比,却已分别为30%、12%和6%。要知道,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决不仅仅是与GDP增量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本质上属于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等精神范畴。文化的外在形式,只是其借以传播和渗透价值观念、精神导向、意识认同等的躯壳与载体。事实上,这些年来西方世界正是通过精心打造和强力推销其新闻、影视、动漫、文学作品、艺术节目等,不绝如缕地将其价值观输送到世界各地,于潜移默化之中对输入国的受众产生深刻影响,促成受众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与服膺。相比较而言,面对美国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等强势攻占中国文化市场的现实,我们却往往难有与之相对应、相抗衡、相交锋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况且,人家高价“卖”进来的,都是有观念、有思想、有意蕴的文化产品。而我们无偿“送”出去的,则大都是一些纯艺术或纯技术的杂技、歌舞民间杂耍之类的节目。至于影视和小说之类富有思想内涵与精神向度的文化产品,虽然产量年年递增,但却鲜有能够走红世界、名扬全球的大制作和硬品牌。素有“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之称的葛浩文就说,虽然莫言获奖让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有所提升,但中国文学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受世界欢迎。而据作家王安忆在国外的实际观察,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王安忆说:“我去国外旅行,经常会跑到书店。但很少能看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踪影,即使有也是被摆在不起眼的地方。由此我了解到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尽管有那么多年的力推,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仍然是少而又少的。”至于影视作品,情况也大体如此。除了汉语圈国家对一些传统内容剧目的青睐外,西方世界则鲜有接受和赏识,这不啻与我们对一些美国大片的热捧形成鲜明对照。

于是,问题便出来了: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我们的文化究竟如何是好?

二

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

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只有独特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魅力。但每一种文化同时又都是包容的,只有包容才能丰富,才能发展,才能提升。不过,包容永远不能取代独特,而独特却定能消解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就正是既从包容中崛起,而又秉有鲜明个性特质的新型现代文化,并以此而成为全球语境中的文化奇葩与精神瑰宝。

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此言,无疑是越来越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论断,即全球化趋向的势不可挡。但问题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为了适应世界口味并走向世界,还要不要和该不该继续有效保持与凸显其自身所秉赋的与生俱有的个性特质?

回答是肯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为此,我们就一定“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成果传播出去。”由于文化是对精神的艺术表达,而任何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前者越个性化越好,而后者则越同质化越佳。一切文化产品最终所要对接的,都是人的志趣、情感与灵魂。而所有物质产品,则只有在高度“统一化”“标准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广泛的相合与应用。因此,举凡需要情趣和情愫易于接受且能直抵心灵深处的精神创造,就都首先必须具有美感和魅力,而个性特质则是涵养、培育、激发和阐扬这种美感与魅力的原始胚基和肥沃土壤,并因此而铸就了文化创造的不可逆性。

不可逆,就是不可回溯,不可重复,不能摹袭、仿照、相似和雷同,也就是要使每一个文化创造都成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正是这种不可逆性,才使文化创造与文化产品有条件有可能凸显个性,熠熠特质,充分展现其自身独特的美,并由此而使文化园地中得以万紫千红、百卉競丽,始终呈现出绰约的风采与新奇的景观,不仅使人深为艳美和感动,而且让人久久吟咏,无限眷恋。任何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都只有在此种情境之下才能被人们欣然接受,而也只有在被受众欣然接受的情况下,文化才能发挥其所蕴寓的启迪、教育、熏陶和审美作用,也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真正以“文明的活的灵魂”自觉而自然地传播“时代精神的精华”。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实现文化的不可逆性并充分赋予其以鲜明的个性特质呢?从大方向、大目标上说,就是要倾力而精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体而言,既要与传统对接,又要和现实融会,更要从不间断的提升和创新中摄取时代光彩,发掘生活底蕴,采掘社会精粹,激荡思想内蕴,直将历史的延宕、时代的脉动、生活的潮音与精神的火光,统统聚合于胸间,升华于心中,表现于台上,凝结于笔下,以大气派和高水平的文化创造不断地将精品佳作提供给大众,传播到世界,倾力掀起“中国文化热”的巨浪与狂飙,使中国文化也同中国经济一样,有着看不完的大动作和说不尽的新精彩。

与传统对接,永远都是增强和凸显文化个性特质的基本要素与前提条件。因为任何“现在”都是从传统延伸而来的,而任何“现在”又都必定要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永远都是我们这个社会、民族和文化的根。但由于在历史的衍化中,“物”的东西都渐渐湮灭了、消融了,仅以特殊的形态沉淀在了文化之中,并因此而使文化成为对历史的惟一记忆和对传统的有效承接。中国如果没有先秦诸子,没有屈原、司马迁、王羲之、顾恺之、李白、朱熹、沈括、郭守敬、罗贯中、曹雪芹以及他们的作品等等,那中国的传统也就很难体现和寻见了。所以,文化传统在事实上常常就是历史传统、民族传统、社会传统和精神道德传统的集合体。中国有五千年文明,这不仅是我们的骄傲和优势,而且事实上它也无时不在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涸濡与促动作用。与此同时,它还为我们赢得了世人的艳美与尊敬。作为这一文化传统的合法拥有者与合理传承者,我们当然要在文化创造和文化产品中融入这一特质,彰显这一优势,并使之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鲜明标识与亮丽色彩。

与现实融会,之所以对凸显文化个性特质既十分必要,又极为重要,盖因现实的内容是广阔的,作用是直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社会变革和生活潮音的过程中,不仅直接决定着文化创造与文化产品的题材内容、思想旨要和精神高度,而且也无时不在浇灌和滋养着文化的思想活力与艺术生命。事实是,无论文化的历史根脉多么深远,思想旨向何等宏阔,它在生成和生效的全过程都必须面对现实——既从现实中汲取生命乳汁,又从现实中拓展传播空间,并以自身的特殊存在方式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和显示着特定的价值。所以说,现实中不仅埋藏着萌动文化植株的种子,而且更深蕴着护佑和催促这植株开花结果的生命元素与驱动力。因为现实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在改革、发展的时代,现实更是活力迸溅、景象旖旎,内蕴丰赡、物华绚丽,处处都激荡着激越的浪涛与感人的音韵。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最能孕育文化精

品和艺术宏构的时代。但关键是谁来发掘和采撷?如何发掘和采撷?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些文化创造者和制造者们,却往往缺乏眼光、耐心和定力。他们太急于收获了,总是刚播下种子就拿起了镰刀,所以采摘下来的常常都是青涩的果实。他们也太觊觎市场和利润了,在文化园地上的任一耕耘,都总免不了以焦灼之心要么望价而为,要么待价而沽。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和创作心境下,虽然我们的产品年年“冒顶”,不断“疯长”,但却鲜有震撼人心、征服世界的宏篇佳构燃然而至,问鼎天下。仅就规模和产量而言,我们当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且以电视剧生产为例,每年就投入资金五六百亿元,生产上万集,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产品能够在电视台播出。目前,仅北京一地,就有影视制作机构2160家。在文学方面,仅在实体长篇小说创作上,每年就能产出四五千部。至于一些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则往往由于屈从于市场效应与商业功利而在追求吸引眼球和欲望刺激时,过多地消解了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社会内在价值,以致造成在文化展示中娱乐化、利欲化和工具理性主义,渐渐成了流行色。这显然有悖于文化创造的真谛与文化生产的规制。因为对文化来说,其永恒的定位和永远的追索,都始终应当是和必须是向善、臻美、尚新、达优。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则正在于对现实的回归与对生活的深耕。

三

在文化创造和文化生产中,实现与传统对接和与现实融会,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这只是铁砧,还需要铁锤来锻造;这只是豆粕,还需要卤水来点化;这只是面团,还需要酵母来发酵。而能够起到铁锤、卤水和酵母作用的,则只有创新。

《易经》上讲:“日新之谓盛德。”而对于文化来说,新,就是生命性,就是吸引力。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的不可逆性,在很多情况下就都主要是由“新”构建并由“新”实现的。因为用于定义和修饬文化的“新”,决不是一般意义和平常意义上的新,而是既以“正确”作为导向,又以“美善”作为前提;既以“传承”作为基础,又以“发展”作为目标;既以“规律”作为范式,又以“实用”作为鹄的的。故此,文化创新的本质内容,就是要在遵循其内在规律和固有法则的基础上,高度体现真、善、美,大力追索颖、异,并在这个过程中彰显明确的价值关切和体现先进的精神指向,从而使文化更加具有时代特质与个性魅力,也更加具有新鲜性和吸引力。只有当“新”体现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先进的社会意识,并融入时代精神和现

实生活,从根本上与真、善、美化为一元时,才会具有价值和意义,也才是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创新。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容易陷入认识误区,在不知不觉中抽去了创新的灵魂,褫夺了创新的本义,使“新”蜕化为一个偏狭而扭曲的概念,甚至就连丑、愚、怪、秽以及俚谑和恶搞之类,也都能堂而皇之地打着“创新”的旗号粉墨登场。

应当承认,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还是相对滞后的。据《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称,在20国集团成员国中,创新竞争力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则排名第八。这就是每个国家的综合创新竞争力而言的,若具体到文化创新上,我们显然是要更偏后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中最应该进行检点和反思的,就是认知偏颇、价值错位、功利驱动、审美异化,缺乏耐心、自信和主体意识。当然了,在对具体作品的淬炼与打磨上,砥砺和沉潜的功力不够、火候不足,也自是原因之一。麦家的《解密》曾在2014年被美国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评介,而作者在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却说:“它几乎差点把我憋死,是我的磨刀石,折磨了我,也磨砺了我。”事实上,好作品都是“磨”出来的。而“磨”,则是实现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解密》不仅写了11年,而且还被出版社退了17次稿。

创新的实施与实现,首先要有正确的定位和明晰的目标,必须解决究竟要创什么样的“新”和如何创“新”的问题。要不然,从低品位出发自以为是的创新的东西,就很容易要么止于争奇鬻怪,要么限于东施效颦。此中有一个普遍跑偏了的题儿,就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时代精神和生活新潮报以冷眼旁观或隔岸观火态度的同时,却热衷于和倾全力迎合西方标准的文化设定。持这样的立足点和方向感进行所谓的创新,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创新”的。因为中国的文化创造既已以迎合西方标准作为至高追求,那就自然会丧失原本具有的优势而范于漂泊而来的劣势。其结果就会像一个肾衰竭病人进行透析治疗一样,虽然换掉了全身的血,但仍旧会始终是一个缺血乏力的病秧子,其作品只能是中国人不看好,外国人也不看好。这是自然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即使你再迎合他的口味和标准,但若与其本土文化比起来,那还是要差多了,玩现代派、意识流、无主题、无情节、时空颠倒、心理自描那一套,你能超过詹姆

思考》。“眼前总是/风雨渐沥/旌旗飘飘/内心总是/荡漾着青春/嘴里总吟唱/逍遥复逍遥”(《衰老之讴》)。对生命哲理的探寻,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使杨剑龙的诗歌不仅自始至终洋溢着生命的真情,同时也极其丰富有一种执著于思考生命意义的高度,展现出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无限张力。换言之,他的诗歌所抒发的情感,不是在空泛的抒情,而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演化、成长的情感真情基础之上的抒情,是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不懈地追求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抒情:真挚、深沉、厚实而富有力度。

生命的演化 and 成长是多维度的,多样性的,全方位的。杨剑龙的诗歌在探寻生命哲理、求索人生意义当中,也显示出他对生命各种形态的认识、把握和展示,充分地展现出他对生命的彻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所怀有的丰富情趣,同时也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生活的多姿多彩,活泼灿烂:

生活中不应总尝甜食/品品苦味,会觉得岁月的甜美/苦丁茶的回味中/不就有着苦尽甘来的丰硕/泡在蜜糖里长大的/却结不出经受磨难后的坚果(《苦丁茶》)

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理解,才会真正地感受到生命、生活的馈赠,才会扬起生命之帆,驶向美丽的港湾。杨剑龙的诗歌总是深情地、细细地咀嚼着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节点,生活场景的每一个片段,发掘出蕴含其中的真情,传达来自心灵的福音。

梁实秋曾指出:“文学里面两项重要的成分 是思想与情感。……文学作者必先对于人事有所感或有所见,然后他就要发而为文,所以文学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的体系。因此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无关,除非那文学先与

实生活,从根本上与真、善、美化为一元时,才会具有价值和意义,也才是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创新。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容易陷入认识误区,在不知不觉中抽去了创新的灵魂,褫夺了创新的本义,使“新”蜕化为一个偏狭而扭曲的概念,甚至就连丑、愚、怪、秽以及俚谑和恶搞之类,也都能堂而皇之地打着“创新”的旗号粉墨登场。

应当承认,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还是相对滞后的。据《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称,在20国集团成员国中,创新竞争力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则排名第八。这就是每个国家的综合创新竞争力而言的,若具体到文化创新上,我们显然是要更偏后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中最应该进行检点和反思的,就是认知偏颇、价值错位、功利驱动、审美异化,缺乏耐心、自信和主体意识。当然了,在对具体作品的淬炼与打磨上,砥砺和沉潜的功力不够、火候不足,也自是原因之一。麦家的《解密》曾在2014年被美国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评介,而作者在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却说:“它几乎差点把我憋死,是我的磨刀石,折磨了我,也磨砺了我。”事实上,好作品都是“磨”出来的。而“磨”,则是实现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解密》不仅写了11年,而且还被出版社退了17次稿。

创新的实施与实现,首先要有正确的定位和明晰的目标,必须解决究竟要创什么样的“新”和如何创“新”的问题。要不然,从低品位出发自以为是的创新的东西,就很容易要么止于争奇鬻怪,要么限于东施效颦。此中有一个普遍跑偏了的题儿,就是在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时代精神和生活新潮报以冷眼旁观或隔岸观火态度的同时,却热衷于和倾全力迎合西方标准的文化设定。持这样的立足点和方向感进行所谓的创新,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创新”的。因为中国的文化创造既已以迎合西方标准作为至高追求,那就自然会丧失原本具有的优势而范于漂泊而来的劣势。其结果就会像一个肾衰竭病人进行透析治疗一样,虽然换掉了全身的血,但仍旧会始终是一个缺血乏力的病秧子,其作品只能是中国人不看好,外国人也不看好。这是自然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和价值取向。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即使你再迎合他的口味和标准,但若与其本土文化比起来,那还是要差多了,玩现代派、意识流、无主题、无情节、时空颠倒、心理自描那一套,你能超过詹姆

思考》。“眼前总是/风雨渐沥/旌旗飘飘/内心总是/荡漾着青春/嘴里总吟唱/逍遥复逍遥”(《衰老之讴》)。对生命哲理的探寻,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使杨剑龙的诗歌不仅自始至终洋溢着生命的真情,同时也极其丰富有一种执著于思考生命意义的高度,展现出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无限张力。换言之,他的诗歌所抒发的情感,不是在空泛的抒情,而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演化、成长的情感真情基础之上的抒情,是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不懈地追求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抒情:真挚、深沉、厚实而富有力度。

生命的演化 and 成长是多维度的,多样性的,全方位的。杨剑龙的诗歌在探寻生命哲理、求索人生意义当中,也显示出他对生命各种形态的认识、把握和展示,充分地展现出他对生命的彻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所怀有的丰富情趣,同时也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生活的多姿多彩,活泼灿烂:

生活中不应总尝甜食/品品苦味,会觉得岁月的甜美/苦丁茶的回味中/不就有着苦尽甘来的丰硕/泡在蜜糖里长大的/却结不出经受磨难后的坚果(《苦丁茶》)

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理解,才会真正地感受到生命、生活的馈赠,才会扬起生命之帆,驶向美丽的港湾。杨剑龙的诗歌总是深情地、细细地咀嚼着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节点,生活场景的每一个片段,发掘出蕴含其中的真情,传达来自心灵的福音。

梁实秋曾指出:“文学里面两项重要的成分 是思想与情感。……文学作者必先对于人事有所感或有所见,然后他就要发而为文,所以文学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的体系。因此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无关,除非那文学先与

实生活,从根本上与真、善、美化为一元时,才会具有价值和意义,也才是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创新。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容易陷入认识误区,在不知不觉中抽去了创新的灵魂,褫夺了创新的本义,使“新”蜕化为一个偏狭而扭曲的概念,甚至就连丑、愚、怪、秽以及俚谑和恶搞之类,也都能堂而皇之地打着“创新”的旗号粉墨登场。

应当承认,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还是相对滞后的。据《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称,在20国集团成员国中,创新竞争力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则排名第八。这就是每个国家的综合创新竞争力而言的,若具体到文化创新上,我们显然是要更偏后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中最应该进行检点和反思的,就是认知偏颇、价值错位、功利驱动、审美异化,缺乏耐心、自信和主体意识。当然了,在对具体作品的淬炼与打磨上,砥砺和沉潜的功力不够、火候不足,也自是原因之一。麦家的《解密》曾在2014年被美国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评介,而作者在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却说:“它几乎差点把我憋死,是我的磨刀石,折磨了我,也磨砺了我。”事实上,好作品都是“磨”出来的。而“磨”,则是实现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解密》不仅写了11年,而且还被出版社退了17次稿。

斯·乔伊斯、阿尔贝·加缪、史迪格·拉森吗? 你的作品能比《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局外人》和“千禧三部曲”更现代派吗? 这等于是丢了自己的龙纹袍,而换上了别家的燕尾服,其结果只能落得个“四不像”。李安的《卧虎藏龙》之所以能得到奥斯卡的赏识,正在于这部电影体现了中国历史、社会 and 文化的个性特质。其他像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极具中华文化风韵的昆曲《牡丹亭》、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双奖的《白日焰火》等,之所以能为世界所喜爱和认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以凸显“中国化”而走向并熠熠了全世界。

在文化产品的辐射与输出中,确实存在一个文化折扣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放弃自我民族特质与时代的特点,而一味舍己从人,东施效颦。恰恰相反,倒是应当和必须更加彰明和凸显我们的民族特质与时代特点。许多世界名著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否则,一旦托尔斯泰、雨果、欧·亨利、海明威、狄更斯、巴尔扎克的作品都变成了一个味儿,那他们还会成为世界名著吗? 所以,关键是要好,要优,要有特色和特质。而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则又主要在于凸显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特质与特点。其实,所谓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就是指文化的民族和时代差异因素对文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加籍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之所以在1988年提出这个概念,其“旨要”惟在于对文化交易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另作歧解,更不能将之作为衰减和泯灭文化之民族特点与时代特质的理由和依据。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创新注定是发展和提升之路,而实现创新的基础、基因、手段和目标,则永远都是以中国的方式而走中国的路,说中国的话,讲中国的故事,切实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而日益一日地熠熠乾坤,唱响世界,使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越来越成为全球语境中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当然,强化和凸显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并不与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多样性营养所对立、所矛盾,关键在于吸收域外文化营养只是为了强化自身、丰富自身、提升自身、发展自身,而绝不是要吞噬和取代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只要目的明确、方法得当,就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以使中国文化的个性特质更厚重、更鲜明、更熠熠,而决不会是消亡与没没。在此,还是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作为尺度与准则吧,他说:“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高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只有独特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魅力。但每一种文化同时又都是包容的,只有包容才能丰富,才能发展,才能提升。不过,包容永远不能取代独特,而独特却定能消解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就正是既从包容中崛起,而又秉有鲜明个性特质的新型现代文化,并以此而成为全球语境中的文化奇葩与精神瑰宝。

真情难忘 生命永恒

□黄 健

思考》。“眼前总是/风雨渐沥/旌旗飘飘/内心总是/荡漾着青春/嘴里总吟唱/逍遥复逍遥”(《衰老之讴》)。对生命哲理的探寻,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使杨剑龙的诗歌不仅自始至终洋溢着生命的真情,同时也极其丰富有一种执著于思考生命意义的高度,展现出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无限张力。换言之,他的诗歌所抒发的情感,不是在空泛的抒情,而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演化、成长的情感真情基础之上的抒情,是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不懈地追求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抒情:真挚、深沉、厚实而富有力度。

生命的演化 and 成长是多维度的,多样性的,全方位的。杨剑龙的诗歌在探寻生命哲理、求索人生意义当中,也显示出他对生命各种形态的认识、把握和展示,充分地展现出他对生命的彻悟,对生活的热爱,以及所怀有的丰富情趣,同时也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生活的多姿多彩,活泼灿烂:

生活中不应总尝甜食/品品苦味,会觉得岁月的甜美/苦丁茶的回味中/不就有着苦尽甘来的丰硕/泡在蜜糖里长大的/却结不出经受磨难后的坚果(《苦丁茶》)

只有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理解,才会真正地感受到生命、生活的馈赠,才会扬起生命之帆,驶向美丽的港湾。杨剑龙的诗歌总是深情地、细细地咀嚼着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节点,生活场景的每一个片段,发掘出蕴含其中的真情,传达来自心灵的福音。

梁实秋曾指出:“文学里面两项重要的成分 是思想与情感。……文学作者必先对于人事有所感或有所见,然后他就要发而为文,所以文学家不能没有人生观,不能没有思想的体系。因此文学作品不能与道德无关,除非那文学先与

实生活,从根本上与真、善、美化为一元时,才会具有价值和意义,也才是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创新。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常常容易陷入认识误区,在不知不觉中抽去了创新的灵魂,褫夺了创新的本义,使“新”蜕化为一个偏狭而扭曲的概念,甚至就连丑、愚、怪、秽以及俚谑和恶搞之类,也都能堂而皇之地打着“创新”的旗号粉墨登场。

应当承认,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还是相对滞后的。据《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3)》称,在20国集团成员国中,创新竞争力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则排名第八。这就是每个国家的综合创新竞争力而言的,若具体到文化创新上,我们显然是要更偏后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中最应该进行检点和反思的,就是认知偏颇、价值错位、功利驱动、审美异化,缺乏耐心、自信和主体意识。当然了,在对具体作品的淬炼与打磨上,砥砺和沉潜的功力不够、火候不足,也自是原因之一。麦家的《解密》曾在2014年被美国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评介,而作者在谈及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却说:“它几乎差点把我憋死,是我的磨刀石,折磨了我,也磨砺了我。”事实上,好作品都是“磨”出来的。而“磨”,则是实现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解密》不仅写了11年,而且还被出版社退了17次稿。

人事无关。”杨剑龙的诗歌做到了这一点,他将日常生活的点滴感悟和积累,汇聚成真诚地拥抱生命、拥抱生活的情感海洋,并让他对生命、生活的思考而生成的一整套哲学、思想,以及丰富的人性都属于其中,赋予沉重的肉身、烦琐的生活,以更加美好的人生意义的支持,并从中构筑精神生命的永恒,展现生活的经典,从而真正地体现出一位真情地讴歌生命、热爱生活的诗人的无限情怀。

“冬日的寒风里/有一只断线的风筝挂在树梢上/它仍然在奋力地挣扎/却始终难以摆脱树枝的纠缠”(《冬日,挂在树梢上的风筝》)尽管生命不是风筝,但在演化和成长的过程中,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无论人们的祝福多么美好,生活着的人们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发现生命的无穷奥秘,生活的无限意义。这不是消极和悲观,而是相反。杨剑龙的诗歌之所以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人文理性的精神,我想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此:发现悖论存在着的生命和生活,恰恰就是构筑生命和生活的长城,使之具有永恒的支点。如同阿基米德所说,给我一个支点,让我撬动起地球。因为生命、生活的金山,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宝藏,杨剑龙就是要去撬动这个宝藏,发掘这个宝藏,并将它奉献给世人,让人们与他一道欣赏、讴歌、赞美生命和生活的光华。

杨剑龙说:“文学是一种有趣味的东西,诗歌是文学的精华,无论我的诗歌写得如何,都是我生命的轨迹,人生的录写。”的确,杨剑龙的诗歌烙印着他的生命轨迹,抒发了他对生活的真情,让人感受到了那跃动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和真性。杨剑龙的诗歌透过生命、生活的重重迷雾,展示出难忘的情思,永恒的情怀。